

中国古代典籍略说

谈谈我国的古籍

“古籍”，顾名思义，就是古代的书籍。古书是文化遗产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因为它能比较完整地纪录与传达古人的思想感情和积累起来的知识。

我国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点，是古书非常的丰富。在这份珍贵的遗产里面，蕴藏着我们祖先不断积累起来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艺术创造与思想发展，但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封建时代的糟粕。因此，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指示，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做到古为今用 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国的古籍非常丰富，那么，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

我国的古籍非常丰富，那么，究竟多到什么程度呢？据眼前已有的材料，可以作出大致的估计，我国现存的古籍约为七万种到八万种的数字。我们已有的数据有下列的几个：

(1) 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种古籍，最近由于上海图书馆根据全国四十一个主要图书馆的收藏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各版‘佛藏’即佛经的大丛书尚未包括在内)从而作出统计，其数字为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即接近四万种；

(2) 没有收入丛书中的单刻本古籍，清朝一代的著作经孙殿起编著《贩书偶记》的纪录，约有一万种；清代以前

遗存的单刻本古籍，还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估计也不会少于一万种；

(3) 我国各地记载山川风土、人情物产的“地方志”非常丰富。现存的地方志，经朱士嘉就国内外主要图书馆及科学研究机构的收藏做了全面调查后编成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统计，是七千四百十三种，十 万零九千一百四十三卷。

以上三大数据，就接近七万种。还有大量的通俗小说、戏剧、唱本和佛经、家谱、金石拓本等等没有比较正确的数字统计在内；同时，上述三个数据之间，也多少有些重复的在内。加加减减，就得出上面估计的总数字。

数字这么庞大的古籍，它们的内容有些什么呢？“古籍”是个笼统的名词，指书籍著作的时代划期而言。我们现在一般地划“五四”以前的著作为古籍。至于它们的内容，按现代的主要学科来分，凡是文（文学艺术）、史（历史）哲（思想意识）科（科学技术）四大科的内容，在我国古籍中都有所包蕴。从这浩瀚的古籍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不但创造了丰富、卓越的文史哲三方面的著作，也从生产实践和向疾病作斗争中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科技知识。现存的医药专业古籍约有两千种，农业生产专业古籍不少于七百种 其他像天文、历法、数学、工程、地学（地理、地质）、生物学等方面，也都有数量不等的专业古籍和散见在非专业古籍中的资料。

现在一般地划“五四”以前的著作为古籍。

古籍的数量既然如此之多，内容又那样的繁复，我们从何入手来掌握它的基本知识呢？与任何学问一样，需要一把钥匙。古籍目录学的纲要，就是我们的一把钥匙。

古籍本身就是封建时代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还应当历史主义地来对待它。

从西汉末年刘向整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藏书，开始进行书籍的分类工作，建立了祖国的图书分类体系以来，后来就发展成为“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法虽然是一个封建思想体系的图书分类法，但古籍本身就是封建时代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代的产物，所以，我们还应当历史主义地来对待它。用这种分类法来治理浩若烟海、棼如乱丝的古籍，倒比较地容易说明它的内容。

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相当于四大学科中的史学。子部大概相当于哲学、科学两个学科，集部大概相当于文艺这个学科。唯独作为第一部的经部，是很特殊的，不能相当于现代学科的任何部门。原因经部是封建文化的标志，这一部所容纳的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认可”的“必读书”，本来不是按照学术性质而设的门类。如果分析经部中所属各书的内容，那么文、史、哲、科样样都有，例如《周易》中的“卦象”含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卦、爻辞”和“大传”也是谈哲理的，所以是一部哲学书；《尚书》和《春秋》是记载史事的，当然是史学著作；《诗经》是一部文学名著，至于科学技术方面，那么有《周礼》里面的《考工记》一篇，是论述铸造工程学的，《礼记》里面的《月令》一篇，是讲物候学的。

“经部”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尊崇“儒学”的结果。

“经部”的形成，是封建社会尊崇“儒学”的结果。我们今天对于旧“经部”中的书，要逐一分析研究，但是也要按照它原来的体系来全面考察，才能了解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完整面貌及其发生、发展和衍变的过程。

经部是由“十三经”、“四书”和两个附从部门——音

乐书籍的“乐类”和文字学书籍的“小学类”组成的。

“一三经”中的十三种书，是逐渐增加而成的。所以要先谈“六经”、“五经”、“九经”和“十二经”。孔子删定的六经是①易②书③诗④礼⑤乐⑥春秋。秦始皇焚书以后，到汉朝收拾残余，亡失了《乐经》，从此就只有“五经”。《礼》自汉代以后，所传凡三书，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春秋经》也有秦以前三个人所作的“传”留下来，即左丘明作的《左氏传》、公羊高作的《公羊传》和穀梁赤作的《穀梁传》。五经中有两经各“一化为三”，就成为“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在京师把九经刻在石上，是为《开成石经》。后来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成为“十二经”。北宋中期，提升《孟子》到经部，于是最后形成了“十三经”。

汉儒治经，注重训诂，就是释明字义、文义；宋儒治经，注重义理，就是疏通道理。宋学以朱熹为大师，他认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是为学之本，乃经典中之经典，所以将这四部书作注，合名《四书》。从此经部中才有“四书”这个门类。

有关音乐的古书编入经部，是因为“六经”有“乐”的缘故。但是现存的“十三经”中，并没有《乐经》。关于文字学的书籍也入经部，这是因为读书必须由学习文字入手；在古代把文字学称为“小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十三经”中的十三种书，是逐渐增加而成的。

汉儒治经，注重训诂，就是释明字义、文义；宋儒治经，注重义理，就是疏通道理。

*

*

*

我国的历史古籍非常丰富，并且体裁也非常繁复，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传记、别史、杂史、载记、政书等。《廿四史》只是正史的一体，不过这一体是历史古籍的骨干，理

《廿四史》只是正史的一体，不过这一体是历史古籍的骨干，理由在于这种体裁的史籍记载得比较全面；更由于它们代表了封建的正统观念。

《廿四史》是清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武英殿刻竣各种正史的时候才定下来的。

史书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体，就是专叙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

由在于这种体裁的史籍记载得比较全面；更由于它们代表了封建的正统观念，所以“正史”之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廿四史》的名称及其作者是：（一）司马迁《史记》，（二）班固《汉书》，（三）范曄《后汉书》，（四）陈寿《三国志》，（五）房玄龄等《晋书》，（六）沈约《宋书》，（七）萧子显《南齐书》，（八）姚思廉《梁书》，（九）姚思廉《陈书》，（十）魏收《魏书》，（十一）李百药《北齐书》，（十二）令狐德棻《周书》，（十三）魏徵《隋书》，（十四）李延寿《南史》，（十五）李延寿《北史》，（十六）刘昫《旧唐书》，（十七）欧阳修等《新唐书》，（十八）薛居正《旧五代史》，（十九）欧阳修《新五代史》，（二十）脱脱《宋史》，（二十一）脱脱《辽史》，（二十二）脱脱《金史》，（二十三）宋濂等《元史》，（二十四）张廷玉等《明史》。

《廿四史》是清乾隆四十年（公元 1775）武英殿刻竣各种正史的时候才定下来的。抗日战争前，开明书店影印殿本，增加柯绍忞的《新元史》，名为《二十五史》。如果再加上赵尔巽等的《清史稿》，则正史有二十六种。

编年体的历史最早是《春秋》，但《春秋》早已升入经部，在史部的编年类中就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最重要的著作；晋代在汲冢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亦属这一类。纪事本末体是以每一件大事的起讫作为记载的规范，不像正史把事情因人而分割开来，也不像编年体因时间而分割开来。这种体裁是南宋史学家袁枢创造的，他的名著是《通鉴纪事本末》。后人依此体补前补后，被汇刻为《九种纪事本末》。

史书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一体，就是专叙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这种体裁是吸取正史中“志”的特长，予以

扩大、加强，系统地撰写而成。创作这种体裁的，是唐代杜佑的《通典》。

史部除历史著作外，还包括地理类和目录学类的书籍。地理书列入史部中，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目录学书现代划归总类或综合类，古代何以列在史部呢？这有悠久的传统。上古国家藏书，由史官管理。周敬王时，老子为柱下史，孔子访周，想读王室藏书，就谒见老子。从这个事例，便能够了解我国目录学对史部从属关系的由来。

在封建的正统观念里，经、史两部的书籍被认为是正当的书，所以有“正经”“正史”的说法，对待子部就另眼相看，认为它“驳杂不纯”和“旁门左道”。现在我们对子部的书应该要有正确的认识。原来子部所包含的书籍，有哲学、科学两个大方面。所谓“驳杂不纯”者，指哲理书而言，正统派指摘它们“驳杂”，实际上正是古代学术思想争鸣、齐放的结果。所谓“旁门左道”，是指科学技术书而言，正统派不很瞧得起技艺之学，贬之为“形而下者谓之器”，自封“形而上者谓之道”。然而在“器”与“左道”之中，却蕴藏着我们祖先在向自然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经验。

为什么称作子部呢？这是由于先秦以及后来的著书立说者，大多数以“什么子”“什么子”为称号，例如儒家的荀子、贾子（贾谊），道家的老子、庄子，墨家的墨子，名家的邓析子，法家的管子，兵家的孙子等等。因此对于这些古代的思想家，有“诸子百家”的提法。清末湖北崇文书局汇刻一百种子书，名为《子书百家》；后来石印的翻版本，又改题为《百子全书》。

史部除历史著作外，还包括地理类和目录学类的书籍。

子部所包含的书籍，有哲学、科学两个大方面。

《百子全书》所收的，是以先秦思想派系为主的“九流十家”（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各家为九流，加小说家为十家）的书，没有“三教”的书在内，因为“三教”起于后代。“三教”即儒教、释教、道教。其实儒教的正式名称是“理学”，不过为着配合释（佛）道二教，就有了儒教这个混名。理学起于北宋，是儒家思想与佛学融化以后的产物，名著有《近思录》（宋朱熹等编）、《象山语录》（宋陆九渊著）等。道教起于东汉，为方士与道家混合后形成的宗教，其主要经典是包含着早期农民起义运动指导思想的《太平经》（据称是东汉于吉编录）；道教中的炼丹术一派创造了铅汞化合物炼制技术的名著《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著）。印度的佛教在东汉初期输入我国，随即迅速而广泛地在思想界产生影响，译经及论著，大量出现。第一部译经是《四十二章经》（汉迦叶摩腾译、魏支谦重译），重要的论著有梁僧佑辑的《弘明集》和唐道宣辑的《广弘明集》。

古典科学技术著作以天文算法、农学、医药三类最为丰富。

古典科学技术著作以天文算法、农学、医药三类最为丰富。天算类名著以《算经十书》为代表。农学遗产以《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王氏农书》（元王桢著）、《农政全书》（明徐光启著）为最享盛名。医理著作推《素问》（号称黄帝著）、药方集成推《普济方》（明朱橚辑）、药典推《本草纲目》（明李时珍编），此外建筑学名著有《营造法式》（宋李诫著），综合科学技术名著有《天工开物》（明宋应星著）。

集部的内容，就是古典文学的著作。

*

*

*

集部的内容，就是古典文学的著作。我国文学的两

集部里的
老祖宗就只有
《楚辞》

大渊源是《诗经》和《楚辞》，《诗》既升入经部，集部里的老祖宗就只有《楚辞》。集部的第一类是楚辞，其次是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小说类、词类、曲类。一个作家的专集列入别集类，如《鲍参军集》（刘宋鲍照）、《杜工部集》（唐杜甫）、《东坡七集》（赵宋苏轼）等。总集类是汇合各家的作品，有两种：一为某时代的全部作家的创作，如《全唐诗》、《全唐文》等；一为选本，如《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唐诗三百首》（清蘅塘退士孙洙选）等。诗文评类收文艺理论著作，如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梁钟嵘的《诗品》等。小说类收平话、演义，如《清平山堂话本》、《水浒传》等，与子部小说家类收笔记和传奇如《太平广记》等者有区别。词类的名著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等。曲类的名著有明代臧懋循选拔元人杂剧一百种编成的《元曲选》等。

（原载 1961 年 11 月 7—9 日《文汇报》）

谈古籍的普查和情报

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列举多项光辉灿烂的业绩，其中之一是“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古籍数量之多，是举世莫与伦比的。继承和清理这份从奴隶社会经历长期封建社会累积和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以此作为“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可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建国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批判继承文化遗产和大力保护与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指引下，我国整理和出版了古籍约两千多种。最近，陈云同志又对古籍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把它提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青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高度来认识，从而大大地引发了古籍工作同志的责任感和积极性。

在浩若烟海的古籍中，需要整理出版的虽然为数也很大，但这只是抉择其精华的部分。

在浩若烟海的古籍中，需要整理出版的虽然为数也很大，但这只是抉择其精华的部分，在整个遗存中的比数则是微小的。可是，在整理出版精华部分的过程中，所有的整个遗存都可作为稽核、参考、研究的用途。再则，重要的是，如李一氓同志所指出的：“古籍整理工作的最终结果应当有一个归纳，就是要总结出一部有关学科的概论出来，这种整理方法就是研究。”例如，“如果不写出一部《中国哲学史》，只是整理出一大堆宋明理学书、佛书，

有什么意义呢？它不能说明在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哲学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而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对中华民族的成长起过什么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此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整个古籍遗存，都成为研究工作中的矿砂。可以在一吨矿砂中只提炼出一克拉钻石，但是必须要有成千上万吨矿砂才行。

于是，摆在我们古籍工作者面前，还有个重要的后勤任务：对于我们的古籍遗存，应当很好地清一清家底，开出总账目，以方便整理者、研究者按图索骥。应当和人口普查、资源普查一样，搞好古籍普查工作。

清查古籍家底的工作，建国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两项工作：第一是就丛书收录的范围对古籍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三大卷《中国丛书综录》；第二是就方志的范围做了普查工作，提供了《中国地方志综录》。正在进行中的一项巨大工作是，编纂全国性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在 1959 年至 1962 年间编成了《中国丛书综录》三大卷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综录》普查了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的 41 个大型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籍丛书 2 797 种。第一卷著录各丛书收录的书目；第二卷为丛书子目的分类目录，由于经过过细的稽勘异同，子目七万多条中一书为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分别作一种或数种处理，最终共得 38 891 种，这就成了丛书中收录古籍的账面总数（如果要不同的版本即两种以上丛书所收的一书来计算，可以还原为子目登录的七万多项）；第三卷是子目的书名索引

对于我们
的古籍遗存，应
当很好地清一
清家底，开出总
账目，以方便整
理者、研究者按
图索骥。

《综录》普查
了全国 20 个省、
市、自治区的 41
个大型图书馆所
收藏的中国古籍
丛书 2 797 种。

和著者名索引。

《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普查了 12 个省、市 28 个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收藏的地方志，著录现存方志 7 413 种。

《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于 1956 年 11 月编成的《中国地方志综录 增订本》普查了 12 个省、市 28 个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收藏的地方志，著录现存方志 7 413 种。附录台湾所藏稀见方志目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稀见方志目。此《综录》在 1958 年出版。据《世界图书》1982 年第一号称：“我国地方志的收藏总数，根据以前的专题目录记载，大都认为只有八千多部。这次在北京天文台同北京图书馆配合下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由北京天文台天文资料组编印了《中国地方志综录（待定稿）》）统计总数是 12 863 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国家现藏善本书品种的总登记目录。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57 年，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发出了“尽快地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重要指示。这项工作，从 1978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召开南京会议部署到现在，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在编委会的领导下，先经过全国各地分头普查、著录，凡 28 个省、市、自治区（西藏及台湾暂缺）的 780 个图书馆（或研究单位及文物单位）参加。又经过一年多的集中汇编，分部类初审和复审，然后修改定稿，正式出版。它将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国家现藏善本书品种的总登记目录。

普查还要做的工作（一）《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了《道藏》但没有收《大藏经》（佛藏）。原因是《大藏经》不似《道藏》的著录那么单纯。《大藏经》的现存版本，有宋刻的《思溪藏》、宋刻的《碛砂藏》、金刻的《赵城藏》、明洪武刻的《大藏》、明永乐刻的《南藏》、明万历刻的《嘉兴藏》、清刻的《龙藏》又有明末至清初的《续藏》编刻 增书

达 310 种；清康熙五十五年左右，复有《又续藏》的编刻，再增书达 220 种。海外则朝鲜有三次刻印的《高丽藏》，日本有《弘教藏》（中国据此本翻印为《频伽精舍大藏经》）和《大正大藏经》，等等。稽勘佛教典籍的异同是个专门之学，而各版《藏经》的总著录篇幅也很巨大。所以当时作出决定，佛藏这一丛书的总目、子目，另行编录成册。所以，这项普查工作，尚待完成。今天，因有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问世，为比勘异同的工作提供了方便。

（二）《中国丛书综录》普查的 41 馆，尚有漏查以及《综录》工作完成后新入藏的丛书，还有 41 馆以外各馆中未经著录的丛书应查编的，需要进行一次复查补充。

（三）《中国丛书综录》以丛书著录为范围，单刻本（或称单行本）排除在外。过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编的《图书总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的《汉籍分类目录》，都是把丛书的子目与单刻本混合在一起，分类编录，虽具有“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的性质，但因为它们仅局限于本馆一馆之所藏，而没有普查的经营功力，所以它们又不能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现在有了《中国丛书综录》这一普查的先行工作，那么要补的一课就是“非丛书”的“综录普查工作”最后与《中国丛书综录》配对成为“中国现存古籍总目”。因而，对我们的古籍普查工作来说，采用最有利的现实条件来推进，需要建立一个“丛书”与“非丛书”的“两半球”的概念，以便于工作的进行并作为统计的基数。

现存古籍总数的估计 罗竹风同志说：“据初步粗略

对我们的古籍普查工作来说，采用最有利的现实条件来推进，需要建立一个“丛书”与“非丛书”的“两半球”的概念。

统计 大约在十万种左右。’^①作为依据的是：

（一）《中国丛书综录》提供的一个基本数字 38 891 种；

（二）上述佛藏^②与丛书补充复查估计可增 10 000 种左右；

（三）单刻本可估计为相当于丛书收录的容量，即 50 000 种左右，用以下根据算出：

（1）地方志 12 863 种，但应除去已收入《中国丛书综录》方志类的 200 种左右；

（2）收录清代著作单刻本以及宋、元、明著作的罕传本的《贩书偶记》正、续两编的著录 17 000 种左右，当然也要剔除其中以单刻本被著录可是那个品种也曾收入、呈现在丛书中的总数字^③；

（3）通俗小说、民间唱本、地方剧本、家谱、碑帖、舆图和兄弟民族语文图书估计约两万多种。

至于把 1961 年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编成的全国 59 所图书馆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7 661 种，1964 年王毓瑚先生编的《中国农学书录（增订本）》六百多种著录算进去，再加上（2）、（3）两项数字的扩大，把现存古籍种数加码到 15 万种，并不完全妥当。因为医书与方志不同，已收进丛书的数量比较大，单刻本所占比重小；《中国农学书录》的著录，存、佚兼收，再加上存者多已收入丛书，因此剩下的单刻本的分量就更打不起来了。从“两半球”的概念出发来萃取统计资料，它们并不适用。

也有偏低的估计，把现存古籍框在 50 000 种左右，如冯蒸同志在《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的“绪论”中说：“中国是文明的古国，已经有了近 4 000 年有文

字记载的悠久历史，在这期间产生的浩如烟海的古籍，究竟有多少种留传到现在呢？这个数字可以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中找到。有人统计，该目录上共载有 49 550 部汉文书籍。这是该研究所内所藏中国古书的总数。但是一般的古书，国外学者认为有 50 000 部左右^⑤。这可以说是比较齐备了。”问题就是在于人文所的目录，只能代表该所的收藏与作为检索用的目录，而不具备也没有进行普查的意图与功力，所以不能代表中国现存古籍的总数^⑥。

但是一般的古书，国外学者认为有 50 000 部左右。

情报业务是个长期的工作，一旦实现了丛书范围与非丛书范围‘两半球’的古籍普查工作，完成了“中国现存古籍总目”之后，也还是要维持情报业务，因为地球之大，随时还会有新的发现。特别是具体校理某种古籍的，必须掌握此书的各种版本，于是披荆斩棘，逢河搭桥，寻踪追索，铁鞋踏破。李一氓同志跋明万历间徽州吴勉学师古斋刻本《花间集》云：“余校《花间集》时，不知有吴刻，付印撰《校后记》时，知有吴刻，而无公私著录可踪迹，无传本可验证，故曰据《歙县志》云云，窃谓此刻殆绝本矣。1958年冬奉召回国，某日午后，由寓闲步至中国书店，主者出示此册，赫然吴勉学师古斋刻本也。……明鏊《花间集》最后得师古斋本，何殊宋槧！”^⑦可谓体会之深。

陈智超同志为正式整理《宋会要辑稿》作准备工作，追寻民国初年著名浙江藏书家嘉业堂主人刘翰怡（承干）在购得徐星伯（松）原辑本后请刘富曾等人整理清缮出的“嘉业堂清本”几经周折，从北京图书馆找出两捆“有整册的，也有零篇断简”的稿件，查核清楚它只是徐星伯原

辑本被删去的内容，于是，又在北京、上海两地“先后访问了与嘉业堂有过接触的同志”，获得线索，然后追踪到杭州浙江图书馆，经他“一再介绍嘉业堂清本的情况和特征”，图书馆同志“从书库中拿出几册没有编目的稿本”让他鉴定；“打开一册封面”赫然是他“在京、沪两地遍觅未获的《宋会要辑稿》刘氏嘉业堂清本，不禁大喜过望。于是，浙图的同志从书库中将这部零乱无序的稿本全部搬出来，经过清理，全部 1460 册完整无缺，这部埋没了多年的稿本终于在人间复出。”回京以后，细查了北图所藏稿件中被删去的内容，证明它们实际上不全是重复的辑文，而是：“（一）内容虽然相同，但因为辑自《大典》的不同字韵，在使用和整理时仍可作校勘之用；（二）同一内容，但比今本徐辑本详细，可以补今本之不足；（三）为今本徐辑本所缺者。”所以，智超同志认为：“把这一部分内容称作‘遗文’比‘复文’更为确切。”^⑧这个生动事例表明，有时候图书情报的工作，还必须搞整理工作的学者亲自出马，寻踪探索。

图书情报的工作，还必须搞整理工作的学者亲自出马，寻踪探索。

辑佚书 清查现存古籍的家底，当然排除已佚（失传）书的著录，但是，佚书之经辑录重光者，仍在登入总账之列。辑录佚书的工作，从宋代已经开始，如王应麟采掇诸书所引郑玄注《易》成《周易郑康成注》1 卷，集录齐、鲁、韩三家《诗》说成《三家诗考》1 卷。明人孙穀征集五经及《论语》、《孝经》的纬书为《古微书》36 卷。清代学者有专以辑佚成家者，如历城马竹吾（国翰）辑经部书 444 种（内纬书 40 种）、史部 8 种、子部 178 种为《玉函山房辑佚书》，甘泉黄右原（奭）辑经解 86 种、通纬 56 种、子史钩沉 74 种。

为《汉学堂丛书》，而乾隆时四库全书馆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部书 66 种、史部 41 种、子部 103 种、集部 175 种合计 385 种 4 926 卷（包括收入《四库全书》以及存目于《四库总目》的），这样就大大丰富了古籍现存书的品种。

四库馆开采《永乐大典》，并没有罄其矿藏，故遗珠往往而有。清嘉庆时大兴徐星伯（松）辑出的《宋会要》，道光时张石舟（穆）辑出的《元朝秘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后来《大典》遭庚子年八国联军焚劫之灾，幸存者不足 1/30，可是里面还有东西可供掇拾，如朱桂辛（启铃）和刘士能（敦桢）从中辑出元代总结木构机械工艺著作的《梓人遗制》（1933 年中国营造学社印），我曾辑出宋元农艺著作《种艺必用》（1963 年农业出版社印）等^⑨。

四库馆开采《永乐大典》，并没有罄其矿藏，故遗珠往往而有。

鲁迅先生曾从古类书及《太平广记》等书辑出隋代以前的亡佚小说 36 种为《古小说钩沉》。近年辑录印出的“再生”古籍，有王叔武辑滇省已亡史志 14 种为《云南古佚书钞》（1979 年），容肇祖辑出王安石的佚著《老子注》（1979 年）^⑩等等。可见辑佚工作，还是大有可为。李一氓同志在《论古籍和古籍整理》中也着重提了：“古人从许多丛书、类书中沙里淘金似的，辑出了不少佚书，对学术贡献很大。如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今后还有许多工作好做。”

出土书“地不爱宝”，古代文物，往往出土，远至殷墟甲骨。世间佚亡的书籍，也往往有自家墓间出。晋太康间汲冢被发，得竹书数十车，就是一个著例。《唐书·艺文志》著录《汲冢周书》十卷。《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就是这个来历。建国以来，国家进行大规